

帝國的傲慢與偏見

——評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國觀》

● 李凱航



在《近代日本的中國觀》中，子安宣邦刻意選擇了幾位立場看似矛盾，但在一個更高的認識論的層次上又彼此關聯的思想家，以闡明「中國的問題即是日本的問題，它決定了昭和日本的國家命運」這個既簡單又深刻的主题。

子安宣邦著，王升遠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觀》（北京：三聯書店，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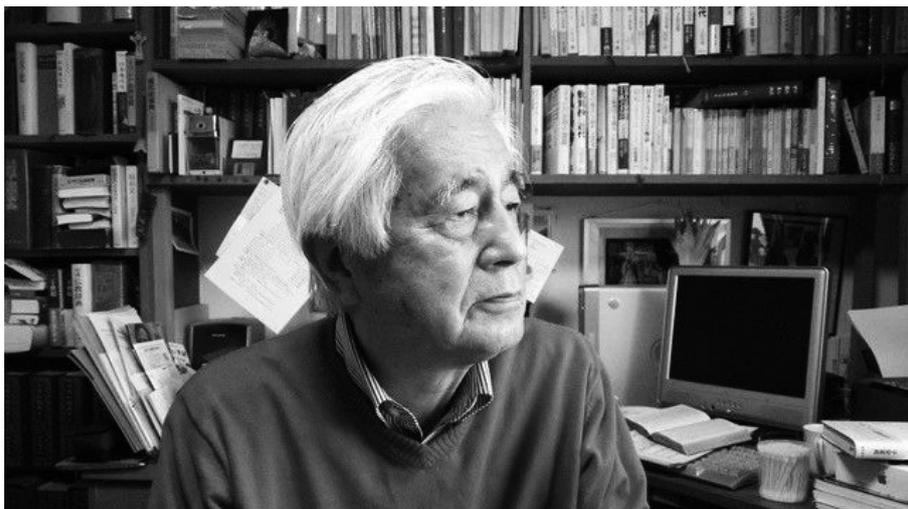
一 導言

「近代日本是如何將大國中國從自己的意識構圖中抹消掉的，且

日本是怎樣確立起自己的一國中心主義的呢？可以說，日本的近代史也就是把東亞中的中國從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從日本人的意識層面抹消的實驗過程。」^①大阪大學文學部名譽教授子安宣邦如是總結道。

子安是日本著名思想史學者，日本近代思想發展的研究論著頗豐，學術影響力毋庸置疑。在2012年於日本出版、2020年翻譯成中文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觀》（以下簡稱《中國觀》，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中，子安刻意選擇了幾位立場看似矛盾，但在一個更高的認識論的層次上又彼此關聯的思想家作為個案，以闡明「中國的問題即是日本的問題，它決定了昭和日本的國家命運」這樣一個既簡單又深刻的主题（頁1）。子安選擇的人物既包括將中國民族主義工具化的北一輝、內藤湖南，也有同情中國革命的橘樸與尾崎秀實；既有強化「亞細亞的專制」理論的森谷克己與親身走

* 本文獲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近代日本琉球學的成立與展開研究」（19C10255006）、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青年課題「『黃禍論』與明治日本的民族共同體想像研究」（2019ELS002）、2021年東華大學外語學院本科教改項目（21WYBK004）資助，特此致謝。



子安宣邦的方法論大致形成於二十世紀末，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識/權力」理論的影響。(資料圖片)

入中國農村進行社會學調查的平野義太郎，也有深入內地作戰、親歷戰爭殘酷的石川達三；甚至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年代裏受西方歷史理論影響、試圖從中國尋找「近代」的竹內好、加加美光行、溝口雄三等，即所謂「將亞細亞(中國)作為方法」。這些思想家的譜系可謂是從左至右，而時間上則是從明治時期延綿至今。他們都有着鮮明的問題意識，而中國則始終是這個問題意識共同的背景。

如果從子安自身的學術生涯來看，《中國觀》可謂是繼《怎樣詮釋「亞洲」——近代日本的東方主義》、《何謂「近代的超克」》以來^②，又一部從「知識考古學」的視角重審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力作。據趙京華研究，子安的方法論大致形成於二十世紀末，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識/權力」理論的影響，開始解構由戰後初期丸山真男所奠定的思想史圖景，即某種為了建構戰後民主主義思想基礎從而在「前近代」江戶時期尋找「近代性

思維」的理論方法——子安稱之為「思想史的虛構」^③。

如果說子安在二十世紀的思想史研究集中在江戶時期及其之前的話，那麼新世紀以來，子安則把研究方向轉向了明治時期以後，而他所解構的對象則從丸山真男轉換為竹內好。前者透過江戶時期尋求「近代」，後者則透過中國尋求日本所缺乏的那種「近代」。子安發現，竹內好的這種預設前提妨礙了其真正理解中國這個認識對象，也在歷史上造成了日本政府許多政策上的錯誤。如果要避免重蹈覆轍，那就必須擺脫這種「近代主義」式的思維方式。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一樣，「要在沒有一種目的論能預先限制的不連續性中分析思想史；在沒有一個預先的範圍能封閉的擴散中測定思想史；……問題在於剝離思想史的一切先驗的自我欣賞的成分」^④。正是基於這樣的研究視角，子安開始重審近代日本的中國觀，以及圍繞此課題而展開的「亞細亞主義」(「亞細亞」為“Asia”〔亞洲〕

子安把研究方向轉向了明治時期以後，解構的對象則從丸山真男轉換為竹內好。前者透過江戶時期尋求「近代」，後者則透過中國尋求日本所缺乏的那種「近代」。

一詞的日文音譯，本書翻譯為「亞洲主義」、「近代的超克」（「超克」為日文用語，有超越、克服之意）等相關問題。

《中國觀》全書分為十五章，基本上是以每個相關人物對應一至三個獨立章節。筆者將按本書順序，分別介紹子安對北一輝、內藤湖南、橘樸、尾崎秀實、森谷克己、平野義太郎、石川達三、竹內好、加加美光行和溝口雄三中國觀的闡釋和評價。

二 亞細亞主義

眾所周知，論述近代日本的中國觀時，亞細亞主義是一種強有力的思想潮流。按照中島岳志的看法，亞細亞主義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為了日本安全保障而將亞洲諸國視為一種政略空間、以獲取資源為主的「政略的亞細亞主義」；其二是為解救國內苦於封建制度壓迫或國際帝國主義侵略的亞洲民眾而形成的「抵抗的亞細亞主義」；其三是作為一種亞細亞主義理論，與「近代的超克」、「東方式社會」等問題相互纏繞，即「思想的亞細亞主義」^⑤。但子安對「亞細亞主義」的定義與上述理解稍有差異，他凸顯了近代日本學者通過「亞細亞」這一「場域」改變日本自身的方法或思想的共同性，從而淡化了不同理論中各種要素的差異：

「亞洲主義」是將日本的變革與中國及亞洲諸民族的變革予以共時性或者聯動性思考的活動者的立場。辛

亥革命中的日方介入者便是此種「亞洲主義」者。對他們來說，中國的變革並不是與身為日本人的自己無緣因而疏遠之的。他們將明治維新的日本國家民族主義變革視為亞洲變革之起始，認為中國的民族變革將與新的日本民族變革形成聯動。（頁4）

只有在此意義上，我們才可以準確地把握，在中國參與辛亥革命全過程的北一輝為何會發出「支那的革命即是日本對支政策的革命」的感慨（頁5）。彼時日本政府採取聯俄政策，鼓動外蒙古獨立，此舉引發了包括宋教仁在內的中國革命黨人的不滿。北一輝認為，原本中國革命就不是起源於對民主的追求，而是出自「旨在救亡圖存的國民自衛本能」，因此，日本的聯俄政策無疑加劇了中國對民族危亡的警覺，中國的南北統一無非是上述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當頭山滿、犬養毅等所謂的「亞細亞主義者」一方面支持分割蒙古的《日俄密約》，另一方面在看到中國南北統一之動向後反過來指責革命黨背叛時，北一輝痛罵道，「地球之上有座愚人島，名曰日本」，而這些「亞細亞主義者」不過是「愚人島表演團在列強環視下出乖露醜」而已，這種「賣人情」式的支持中國革命者不知自身原本就有問題（頁19-24）。

北一輝認為，辛亥革命的動因事實上與明治維新無異，就在於國家民族主義思想，這種國家民族主義思想必定會衝擊既存的國際秩序，那麼日本最好的政策是將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引向俄國與英國^⑥。

子安對「亞細亞主義」的定義與中島岳志的理解稍有差異，他凸顯了近代日本學者通過「亞細亞」這一「場域」改變日本自身的方法或思想的共同性，從而淡化了不同理論中各種要素的差異。

換言之，只有徹底地排除英美勢力，才能實現亞細亞主義。子安則暗示，乍一看北一輝的言論似乎與頭山滿等人有所區別，是在極力鼓吹中國的民族主義，但實際上不過是將之工具化，以便實現日本的領導權而已，正如宋教仁對北一輝的批評：「足下所云，為何似同喧囂的浪人之輩。」（頁22）

在子安看來，內藤湖南是一位將以上觀點理論化、學術化的學者，他代表着一種「作為近代知識的中國認識」，在本質上與薩義德（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東方學家無異。他之所以發出「替支那人為支那考慮」的感歎，也是源於那種對認識對象的「控制欲和權力感」（頁29-30、34-36）。他一方面指出中日文化上同根同源，「日本同江蘇或山東一樣，是（中國的）十八省之一，甚至也可稱為日本省」，另一方面卻以先進的日本肩負指導落後的中國的責任為由，主張「亞細亞門羅主義」，即從歷史學的研



內藤湖南游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治學取向，被子安借用竹內好的話來批判。（資料圖片）

究出發，指出佔領中國的關鍵在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中間團體」，即鄉黨宗族：「若能鄉里安全，宗族繁榮，日日安居樂業，則無論何國人統治，皆可柔順服從之。」^⑦子安借用竹內好的話來批判內藤湖南這種游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治學取向：那是一種「能將所有一切最終予以對象化提煉的、徹底的合理主義信念」（頁37）。

相對於「文獻學式的史學家」內藤湖南，橘樸依靠的是「現場主義式的」經驗與直覺。自1906年時年二十五歲作為記者踏上中華大地以來，直至1945年10月於瀋陽去世為止，橘樸的一生幾乎全部呆在「大陸政策」現場——中國。因此，他得以有機會深入中國內地農村進行大量的社會學調查工作，由此獲得孫中山所謂的「社會革命」的實際體驗（頁54-57、65-67）。他不但否定了內藤湖南描繪的衰老而停滯的中國形象，反而認為中國「在政治上不是太老了，毋寧說是太年輕了」。橘樸將內藤湖南所描述的靜態的地方鄉團自治組織，視為動態的「階級鬥爭式社會變革觀」的實現場域（頁70-71）——這就是橘樸在臨終前「拿着戰略地圖預測中共軍隊終將征服全中國」，而內藤湖南始終漠視「中國平民之未來與自立性革新」的原因（頁60、50）。

不僅如此，子安還觀察到，對農村問題的關注促使橘樸把視線轉向「滿洲」，而非「日本」。在橘樸看來，因為彼時的日本被資本家、權貴階級壟斷權力，只能寄希望於「能得到大眾支持的革新派行動者」青年將校進行革新運動，他們建設

相對於「文獻學式的史學家」內藤湖南，橘樸依靠的是「現場主義式的」經驗與直覺。他不但否定了內藤湖南描繪的衰老而停滯的中國形象，反而認為中國「在政治上不是太老了，毋寧說是太年輕了」。

的「滿洲國」將成為改造日本與亞洲的基石(頁88-90、95)。不論此想像是否合理,就橘樸試圖通過「滿洲國」變革日本國內體制而言,是非常符合亞細亞主義的。

三 「近代的超克」

隨着中日戰爭規模的升級,符合新形勢的中國形象也被日本官方納入議程之中。子安自己也經歷過這種轉換。1942年,當時已經是小學四年級學生的子安聽到老師說起「日本長期以來一直在戰爭中」之時,他一臉驚訝之情:「我一直認為前一年的1941年12月所發動的與英美的戰爭才剛剛開始呀!」由此可見,對於當時日本的孩子,甚至是包括教師這樣的大人而言,那場在中國投入兵力高達幾百萬人、幾乎耗盡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軍事行動並未被視為戰爭;所謂的「戰爭」必須能夠展現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抗衡的日本帝國那種光輝的自我形象^⑥。

原本對1937年「支那事變」(蘆溝橋事變)懷有愧疚感的日本知識份子,正如竹內好聞知與美國開戰的布告時,特意記下「我們因感動而戰慄着……用目光追隨着那如同彩虹般劃破天空的光芒」一樣,內心的積鬱被一掃而光^⑦。在他們看來,對中國的非正義的戰爭,因為對帝國主義國家即歐美列強的宣戰,終於獲得了正當性。這種正當性迅速以理論化的形式表現出來,諸如「近代的超克」、「世界史的立場」、「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

體」等新舊概念紛紛登場。這些理論的核心目標,在於抨擊產生於近代歐洲歷史經驗的民族國家體制,試圖以日本帝國主導的「廣域圈」,即「大東亞」來代替之。子安指出,這種「大東亞」概念並非僅僅源自明治時期以來的亞細亞主義傳統,而是「日本對中國乃至亞洲的戰爭發動,引發既成的諸種意識形態論會聚在一起」而被再發明出來的^⑧。

例如,戰爭期間在殖民地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擔任副教授的森谷克己,其對「東洋」的認識借助了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的「東方式社會」理論。魏特夫認為,「封建社會的『本質性社會關係』是農奴與封建領主之間的關係」,而「東方式社會」的本質是「『被村落化地限制起來的或者自由的農民,與絕對化的皇帝及官僚』之間的關係」,「與西方的分權式封建國家相對,『東方』的國家秩序是『中央集權式的絕對主義官僚國家』」(頁123),其原因就在於大陸型國家需要「灌溉農業」與「大規模治水」這兩種「集權性的經濟職能」。森谷克己以日本無需治水為由而將其排除在「東方式社會」之外。在子安看來,這種論調「確實對中國的近代化何以蹉跎於起點並陷入了負面的停滯狀態,給予了歷史結構主義式的說明,也解釋了在亞洲何以僅有日本成功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頁125)。

但森谷克己對魏特夫的研究目的決不在於把中日兩國差異化,毋寧是透過「村落協同體」概念的導入,重新定義了「東方」:「之所以感覺東亞社會原本便是與西方不同,具有協同社會性質,是由於畢

在竹內好等知識份子看來,對中國的非正義的戰爭,因為對帝國主義國家即歐美列強的宣戰而終於獲得了正當性。諸如「近代的超克」、「世界史的立場」、「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等新舊概念紛紛登場。

竟在東亞，父權家長制家族、宗族制度以及村落協同體等從古至今頑強地保存了下來。」子安發現，在森谷克己筆下，「被置於『西方』對立面的『東方』就已不是以專制和停滯所表述的東方了，而是有其獨特文化價值、志在革新的『東方』了」（頁129）。

相對於森谷克己而言，東亞研究所調查員平野義太郎奔赴中國華北地區進行了直接的社會調查（頁134）。他以調查報告的形式深化了森谷克己的「理論」且讓其更具「時局感」：「為了大亞洲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必須將其構築在東方共通的客觀社會基礎之上。而東方社會之基底是鄉土共同體。大亞洲主義也無非就是東方民族鄉土觀念的擴充」，而這也是他所認為的「大東亞共榮圈」政治理論的基礎，即「亞洲式鄉土共同體」（頁132-33）。

然而，不論昭和時期的亞細亞主義如何重塑「大東亞」概念，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民族主義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被激發得更為猛烈。儘管大多數日本論者選擇無視這種現實，但仍然有人保持了清醒的認識。例如，因1941年「佐爾格事件」而被牽連出來的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著名蘇聯「間諜」尾崎秀實^①，就曾感歎結束戰爭無望的現實：「與〔中國的〕民族問題相比，『東亞協同體』論是多麼慘不忍睹、微不足道」，「支那經濟實力貧弱，政治體制不完善，軍隊低劣而軟弱，卻好歹撐到了今天，其謎底實則在於民族問題。這不僅是國家層面的問題，讓人頭疼的游擊戰士自

不待言，所有政治勢力，從拒絕合作、只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夫到街頭流浪少年，民族問題以各種形式出現，無處不在」（頁114、113）。在筆者看來，在無處不在的「民族問題」中，所謂的「近代的超克」無非只是日本人的一廂情願罷了。

相對於「近代的超克」這種純粹理論上的問題，石川達三親身抵達南京大屠殺的現場似乎更能體驗戰場的本質。1937年12月，他受《中央公論》社派遣，從東京出發去上海，翌年1月抵達南京。「我錯過了入城儀式，正月裏抵達南京時，街上已經是屍體纍纍，事態嚴重」。他專程採訪了參與南京大屠殺的第16師團第33連隊，並以此為契機創作了小說《活着的士兵》。儘管該小說在編輯部內部刪改內容達四分之一以上後才得以公開發表，石川達三還是因「反軍的內容，不利於時局穩定」，遭到四個月監禁的嚴厲處罰（頁150-52）。他隨後表示，不存在所謂的「南京事件」（頁158）。在子安看來，小說原本是「虛構」的文學創作，反而可以成為更為真實可信的「證言」（頁154）。與此時甚囂塵上的「超克論」相比，這裏的「真實」與「虛構」存在着某種顛倒的關係。

四 竹內好及其批判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關於日本戰前社會性質的爭論也隨戰後民主改革而展開。不論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批判戰前日本因資本

不論昭和時期的亞細亞主義如何重塑「大東亞」概念，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民族主義被激發得更為猛烈。儘管大多數日本論者選擇無視這種現實，但仍然有人保持了清醒的認識。例如，尾崎秀實就曾感歎結束戰爭無望的現實。

子安批評了西洋學者（包括日本學者）獵奇式地在竹內好那裏尋找「近代」，而他所關心的，毋寧是竹內好的思想本源。子安指出，並不觸碰黨史研究的竹內好對中國革命的描述的確是非常文學化（虛構化）的。

主義革命不徹底導致封建制度殘餘的左派學者，還是按照韋伯的理論，批判日本近代化不徹底導致法西斯主義橫行的丸山真男，他們大多以西洋近代化視點為基準。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竹內好雖然不屬於這二者中的任何一派，但對於從中國出發思考「近代」的他而言，事實上更傾向於後者。

2004年9月，在德國的海德堡大學舉辦了一場題為「竹內好——思考了存在於亞洲的另一種現代化的思想家？」的研討會引起了子安的關注。他表示：「我本人對於歐洲尤其是德國的東洋學、日本學的實際狀況有體驗性的了解，現在，我對於他們面向亞洲的認識性關懷，和對於竹內好一樣，均持十分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那種關懷，直接說，就是存在於對德國的竹內研討會懷有期待並進行呼應，在當下日本再次進行竹內好討論的人們那裏的、追求『另一種現代，或者亞洲式現代』的這種思想性關懷。不過，關於他們違背竹內好的本意、追求實體性『亞洲式現代』的思想性關懷，則應當作為後竹內式問題重新進行思考。但我說的『竹內好』這一問題不是那樣的問題」^⑫。

子安批評了西洋學者（包括日本學者）獵奇式地在竹內好那裏尋找「近代」，而他所關心的，毋寧是竹內好的思想本源。眾所周知，竹內好以「抵抗的、自律的、真正的」（回心）與「屈從的、他律的、虛假的」（轉向）分別概述中日兩國近代化的過程（頁199），「因為〔日本〕

沒有抵抗，也就是沒有保持自我的欲求（沒有了『自我』本身）。沒有抵抗，就是說日本不是東方式的；同時，沒有保持自我的欲求，就意味着日本不是歐洲式的。換言之，日本甚麼都不是」（頁192）。在觀察近代中國的歷史中，竹內好從魯迅與毛澤東身上發現了「抵抗者」的具體形象。前者以「奴才論」來展示「作為覺醒的奴才、抵抗主體的奴才」視角（頁187），而後者的抵抗意識則是在井岡山「內外交困之時、喪失一切之際，一切又可能盡為其所有之時建構起來的」（頁207）。

子安指出，並不觸碰黨史研究的竹內好這些對中國革命的描述的確是非常文學化（虛構化）的：

竹內對近代日本之虛偽「近代」徹底的自我否定，讓他肯定了中國由自立性民族主體所推動的、真正的「近代」革命。他以「魯迅」表述了前者，而將後者凝聚在「毛澤東」的形象之中。但竹內所塑造的「中國」「中國革命」和「毛澤東」，都只是「近代日本」的自我否定描繪出的他者形象。竹內筆下「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的光彩炫目與對「近代日本」之自我否定的慚愧心緒是成比例的。然而，「近代日本」的負面自我形象所定義的正面的他者「中國」形象，在1960年代以降的歷史進程中完全喪失了炫目的光芒。（頁210）

竹內好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做「近代批判」之一環加以表述，但這種「荒誕不經、錯得離譜的時代認

識」(頁221)的確是竹內好將中國形象文學化在邏輯上的延伸(頁224)。當竹內好開始為文革搖旗吶喊之時，子安就坦言道，「竹內那完全『成熟』的思考態度看起來真令人膩煩」(頁196)。

但竹內好的中國觀依然是戰後日本最具影響力的見解之一。在1964年戰後二十周年之際，《中央公論》票選最具影響力的論文時，竹內好的〈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僅次於丸山真男的〈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頁175-76)。他對中國的理解，吸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之時還是大學生的日本人的關注，正所謂「既非歐洲，亦非美國，這種對亞洲之中國的思想憧憬，前所未有地成為他們〔戰後日本大學生〕學問研究的動機，並決定了其思想態度」(頁236)。

子安以加加美光行與溝口雄三為例，批判了竹內好及其後學在中國形象文學化上的繼承關係。例如，加加美光行為了呼應當時日本社會發生的大學紛爭、水俣病、三里塚鬥爭等運動，就談到「從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對起因於科學萬能主義之傲慢的核戰爭危機、公害與破壞、教育與醫療之荒廢等現代社會的種種危機感到憤怒、並欲挺身而出的人們而言，『文化大革命』與越南戰爭同樣，是給予人們以夢想和烏托邦的『革命』」。子安由此批判其將日本社會問題、文革和越戰「試圖歸結和表述為『亞洲的憤怒與鬥爭』」，是出於「其錯誤的世界認識、歷史認識之魯莽表達」(頁219、221-22)。

與加加美光行從現實的文革中理解中國不同，溝口雄三是從歷史哲學的角度觀察中國，其核心目標是「將中國作為構成要素之一，換句話說也將歐洲作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頁245)。這裏馬上就讓子安想到，溝口雄三與竹內好甚至是其他「近代的超克」論者一樣，都是在共有的「以中國為方法」之「近代」認識的思想背景下，向歐洲以至世界所定義的「近代」要求復權。子安明確地批判道，「由此出發所通向的與其說是『多元世界』之世界認識，不如說是『中國式世界』這一對抗式的『一元世界』結構，不是嗎？這便是『以中國為方法』這一中國認識的巨大陷阱」(頁246)。聯想到高山岩男1942年在《世界史的哲學》一書中的發言(「支那沒有世界史意義上的世界觀念。支那是與歐洲匹敵的一個世界」)時，子安就覺得戰後溝口雄三的言論「就像從歷史中被召喚出來的、亡靈般的語言」一樣(頁246-47)。事實上，竹內好在重審「近代的超克」時是有讓步的。他在1961年的演講中談及亞洲時坦言道：「我想那〔亞洲〕恐怕不是作為實體性的存在，但是可以作為方法而存在，不是嗎？」但無疑溝口雄三所謂的「亞洲」(中國)已經是非常明確的實體了(頁240-41)。

五 結語

據子安在〈後記〉中介紹，《中國觀》是由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

子安想到，溝口雄三與竹內好甚至是其他「近代的超克」論者一樣，都是在共有的「以中國為方法」之「近代」認識的思想背景下，向歐洲以至世界所定義的「近代」要求復權。

從子安對近代以來日本有關中國的言論和認識的分析來看，雙方離真正的理解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子安的「中國論」，正如他在書中所論及的形形色色的「中國論」一樣，必然對中日兩國產生深遠的影響。

期間在《現代思想》連載的〈讀中國論〉彙集而成(頁256)，就寫作時間而言，是辛亥百年前後。這或許就是本書首先登場的人物是北一輝——一位深度參與辛亥革命的日本思想家的原因吧，這種深度參與中國歷史進程的日本人其實不在少數。子安坦言道，他在閱讀橘樸著作時也感到「茫然無措，束手無策」，「讀畢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後，我亦有同感。為甚麼日本近代史會孕育出宮崎滔天和橘樸這般幾乎畢生都與中國牽連在一起的人物？他們周圍還有幾十個、幾百個與他們同樣在中國終其一生的人物吧。但孕育了宮崎滔天和橘樸這般人物的，正是日本的近代」(頁60)。換言之，對中日兩國而言，彼此的關係並非簡單地視對方為外國。它們之間的歷史是相互影響甚至直接介入的。

但從以上子安對近代以來日本有關中國的言論和認識的分析來看，中日雙方距離達致真正的理解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在辛亥百年之際，這種差距甚至被經濟貿易往來的假象進一步擴大。正如子安所言，「對近來中國政治的觀察讓我轉向了對戰後日本中國觀的重新審視。在現代，已完全喪失了批判性和思想性機能的日本亞洲主義，抑或中國主義這類對亞洲和中國的『袒護』，到底意味着甚麼，這一追問也是促使我『讀中國論』的原因」(頁256)。子安的「中國論」，正如他在書中所論及的形形色色的「中國論」一樣，也必然對中日兩國產生深遠的影響。

註釋

- ①⑧⑩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近代日本的亞洲觀》(北京：三聯書店，2019)，頁2；1-2；61。
- ② 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03)；《「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東京：青土社，2008)。後者的中文版，參見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譯：《何謂「現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18)。
- ③ 趙京華：《日本後現代與知識左翼》(北京：三聯書店，2007)，頁132-44。
- ④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261。
- ⑤ 中島岳志：《アジア主義——その先の近代へ》(東京：潮出版社，2014)，頁30-31。
- ⑥ 野村浩一著，張學鋒譯：《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頁67。
- ⑦ 傅佛果(Joshua A. Fogel)著，陶德民、何英鸞譯：《內藤湖南：政治與漢學(1866-1934)》(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頁9、212-13。
- ⑨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165。
- ⑪ 「佐爾格事件」是指紅色間諜佐爾格(Richard Sorge)冒充德國記者，受蘇聯共產國際委派前往日本蒐集情報一事，其關係網絡包括時任近衛文麿首相內閣囑託之一的尾崎秀實。1941年，尾崎秀實與佐爾格先後被日本特高警察逮捕入獄，被判有罪。1944年，二人被處死。
- ⑫ 子安宣邦：《何謂「現代的超克」》，頁132-33。

李凱航 上海東華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